

# 析墨西哥一九九四年大選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根據墨西哥一九一七年憲法規定：墨西哥為一聯邦共和國，其總統由全民普選之，任期六年，不得連任；國會為兩院制，參院議員每三年改選半數，而衆院之代表則每三年改選一次。

今（一九九四）年適逢墨國之大選年，選前各項預測資料顯示，執政黨將面臨一次史無前例之殘酷考驗；尤在總統競選方面，將接受來自在野黨對手的強力挑戰。惟在選舉結果揭曉時，執政長達六十五年的「制度革命黨」仍是這次大選的最大贏家。

本文擬透過墨國的政黨政治、執政黨政績、各黨參選政見、選舉文化與選民心理等要項，對此次大選形勢加以剖析；同時，擬據此次大選結果對墨國政黨政治發展與未來政局略予蠡測，以爲之結。

## 一、前言：政黨政治概況

墨西哥一九九四年的總統與聯邦議會選舉，已於八月下旬落幕，選舉結果仍是由久掌政權的「制度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 PRI) 獲得壓倒性的勝利。<sup>①</sup>

註① 「制度革命黨」一詞，或被譯之爲「憲政革命黨」，或以「革命制度黨」稱之，惟筆者認爲，以「制度革命黨」譯之，較符原義。另該黨於一九二年初建時，命名爲「國民革命黨」(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嗣後於一九三八年又更名爲「墨西哥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Mexicano/PRM)，八年後，即在一九四六年始延用今名，由此命名過程，吾人亦可窺知該黨之屬性與理念。

墨西哥的「制度革命黨」自一九二九年取得政權後，即透過憲政體制與民選形式，在一黨獨大而無競爭對手的政治環境中，以形式民主為手段，主控著墨西哥的政權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終而使該黨與墨國政府官吏以及部份民間團體演變成一個「三位一體」的政府獨佔勢力，壟斷了墨國的政治資源；因此，吾人與其稱墨國的政治體制為「民主政制」，還不如稱之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寡頭主義，較為符合該國當代的政治現實。

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地區諸國中，算是推行民主政治較早的國家之一，那麼為什麼迄今仍存在著「制度革命黨」一黨獨大和一黨專政的異常現象呢？或說這是由於墨國的政黨政治不發達，或尚未臻成熟。但經更深一層分析之，則知墨國政黨政治之所以發展不良，係由該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生態使然。換言之，從歷史的角度觀之，這是受西班牙三百多年殖民統治法沉積下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總體文化現象之影響，如考迪羅主義（Caudillo）和地方角頭（Caciques）干政傳統。<sup>②</sup>若從政治生態角度審視之，「制度革命黨」一黨獨大及一黨專政，或沒有一個強而有力之反對黨與之相抗衡，則是由現實政治與政治現實互動所形成之政治生態使然。如墨西哥的民粹主義思潮將「制度革命黨」（該黨於一九三八年以前名「國民革命黨」）推上政治社會的舞台中心，而該黨則掉過頭來利用墨國的民粹主義和革命激情去發展黨的群眾基礎，並控制了絕大部份的政、社資源，進而在墨國的政治角力場上形成一黨獨大與排擠效應，嚴重的妨礙了政黨政治的發展機會，也強力的壓縮了其他政治力量的生存與活動空間。所以，除了「全國行動黨」（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 PAN）於一九三九年誕生外，直至五〇年代初始有不同意識形態與政治主張的小黨出現，然而他們也只能在被壓縮的政治空間中，長時間的扮演著政治配角或「花瓶政黨」的角色而已。<sup>③</sup>

迄今，雖然墨國的政黨林立，各色各樣的政黨派三十多個，但有助於墨國政黨政治發展，並有實力與資格能在中央與地方選戰中，和「制度革命黨」一較高下者，只有右派的「全國行動黨」及左派的「民生革命黨」（Partido de la Renovación Democrática / PRD）由三個中間偏左的黨派所組成之聯合陣線，詳後）兩大政治勢力而已，其他小黨不僅難成氣候或影響政局，其自身亦分合無常或僅聊備一格（詳後）。

## 二、對政黨體制的檢視

註② 關於墨西哥之政制發展歷程，請參曾昭耀「論墨西哥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墨西哥如何從考迪羅主義走向現代憲政制度」，拉丁美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二十四～三十頁；第二期，第二十九～三十九頁。

註③ 關於墨西哥的政黨政治發展，請參楊仲林「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政黨制度的發展」，拉丁美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三十一～三十六頁。  
析墨西哥一九九四年大選

欲對墨國政黨政治與本年大選之關係作更深一層之瞭解，則須對該國之政黨體制略加分析；即先行認識其組織體系、政治理念和基本政策路線等，以利吾人對「制度革命黨」每選必勝或長期執政的緣由，有所體認。

墨國的政黨政治發軔於一九三〇年代初，在嗣後二十多年歲月中，尚有兩個小黨——前述之「全國行動黨」和「墨西哥真正革命黨」(Partido Auténtico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 PARM)與「制度革命黨」同時並存，但前二者均屬右翼黨派，在政治理念方面均主張發揚墨國的革命精神及擁護一九一七年憲法。除「全國行動黨」表示堅決支持教會之立場外，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可謂同質之政黨，但二者力量薄弱，也從未以聯合陣線方式投入選舉，或在國會中對執政的「制度革命黨」產生絲毫制衡的作用。

循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墨國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震天價響，終於一九五八至五九年間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與罷工，迫使執政黨於一九六三年提出修憲案，擴大弱小黨派在眾院的問政權。乃規定眾院議員除以選舉方式所產生者外，另對少數小黨採用所謂「黨派眾議員」制，<sup>④</sup>藉以寬鬆在野政黨的生存空間。

爾後，在墨國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中，一些左派或中間偏左的政黨便在七〇年代應運而生，如「共產主義左派聯盟」(UIC)、「墨西哥民主黨」(PDM)以及「全國重建陣線」(PERCEN)等，紛紛登上墨國的政治舞台。但這種如雨後春筍般的政黨多產現象，對墨國的政治民主化與政黨政治的成熟度，並未產生可觀的正面效應，甚至分散乃至削弱了在野政治黨派與「制度革命黨」相抗爭的力量，而且無力發揮反對黨在國會中的主要政治功能——監督與制衡。因此，「制度革命黨」一黨獨大與一黨專政的強勢地位，終未受到嚴厲的挑戰，直至一九八八年的大選後，始在眾院中失去絕對多數的優勢。<sup>⑤</sup>今再進而對墨國當前主要政黨的體制加以檢視，將更為具體而有利於吾人對墨國政黨政治及選舉文化之認識。茲就墨國的三大政治力量——「制度革命黨」、「全國行動黨」和「民主革命黨」之相關諸元分析於下：

(一)「制度革命黨」：首就該黨的組織結構言之，在一九一九年初建時，係由當時的總統卡里亞斯(Putarco Elías Calles)以國家元首的身分，運用行政力量與公共資源所建立之「政府黨」。卡氏先將政府之公務員、各工會會員等納入該黨；繼之又將各地之公會社團及農民團體等吸收為基層黨員；嗣後再將墨國的青年組織與婦女團體，收編之為該黨的

註④

墨國當時新設之「黨派眾議員」制，規定若各小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二點五的選票，便可取得五個眾議員席次；若所得選票增加百分之〇點五，可獲得一個席位，但「黨派眾議員」之最高限額為二十席。此制與墨國現行之「比例代表制」不同，也與我國之「不分區立委」的性質有異。

註⑤

一九八八年大選後，「制度革命黨」在眾院的五百個席次中，只佔有二六一席，已喪失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優勢。爾後，在一九九一年的期中選舉後，該黨的席次雖上升為三〇〇席，但仍未達絕對的多數。

「人民部」；進而透過政府的行政管道，使各地之地方角頭（*Caciques*）與該黨之基層組織相結合，構成地方黨部之有力支柱。所以，「制度革命黨」自始至今便是一個政、社、群的共生體。<sup>⑥</sup>

再從「制度革命黨」之組織形式與運作模式觀之，該黨目前擁有黨員三千餘萬，其組織結構頗似一個系統綿密而網狀分佈的「工團主義」政黨，具有較高的群體動員能力。至於該黨的黨務運作方式，經理論角度言之，在推荐各級公職候選人時，各職工團體均可循民主方式，享有獨立提名權；但在實際運作時，則完全背道而弛，除少數地方公職參選人可由地方黨部議決外，凡參與聯邦參眾議員選舉之候選人、州長及總統候選人之提名權，率由現任總統欽定之。這種由總統一人親身包辦的提名方式，乃構成墨國政治史上所謂「總統至高主義」（*presidencialismo*）的部份特質之一。<sup>⑦</sup>此一特質當然已對該黨內部民主與墨國政黨發展產生深遠之影響，也從而間接的污染了墨國的選舉文化（極易製造各式各樣的選舉弊端）。

（二）「全國行動黨」：該黨自一九三九年建成以來，一直堅持其政治理念，扮演著一個較保守的右派角色，充任著教會與工商市民階級的代言人；主張民主自由及實現名實相符的聯邦主義，故反對一黨專政及中央集權。該黨在都市和墨國北部較富庶之州郡與聯邦地區（墨西哥市區），獲得中產階級和非土著人民之支持，因此，而被視同一個屬於中上階層的「城市政黨」，而不是一個屬於中下階層的「鄉村黨」。所以，在黨的群眾基礎及組織型態與結構等方面，均較帶有「工團主義」色彩的「制度革命黨」為薄弱而鬆散，迄今只有黨員六十多萬人，且不易獲得墨國較大多數中下階層的支持，故其動員能力與能量均嫌薄弱。雖然該黨自一九四六年起，便投入每六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但每戰皆墨，只有在聯邦議會參眾議員及北部少數州郡公職人員選舉中，獲得部份的席次與職位。<sup>⑧</sup>

關於「全國行動黨」在歷次選戰中，屢戰屢敗或斬獲有限之因，固然與該黨之群眾基礎尚弱、動員能量有限、政治資源不足、政黨屬性偏右而保守攸關，但其基本政策左袒中上階層，以及競選策略失算（如對執政黨存有幻想而且態度曖昧，以及對天主教會走得太过近等），當然也是造成選戰失利的負面因素。

（三）「民主革命黨」：該黨實際上是一個左派聯合陣線，為投入一九九一年的期中選舉，而於一九八九年由「民主運動」

註⑥ 關於「制度革命黨」與其他共生體之間的主從關係與相互利用等，請參Judith A. Hellman, "Mexican Popular Movements, Clientelism, and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1, No. 2 (Spring, 1994), pp. 124~142.

註⑦ Mayne A. Cornelius, "Mexico's Delayed Democratization," *Foreign Policy*, No. 95 (Summer 1994), pp. 53~71.

註⑧ 「全國行動黨」於一九九一年期中選舉後，在參院六十四席中，僅佔一席；在五〇〇席眾院中，佔有八十九席（其中七十九席為比例代表，僅十席屬選舉所產生；另在三十二個州中，贏得三個州長職位。見*The Europa Year Book 1993*, pp. 1938~39;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7, 1994, p. 10

(Corriente Democrática / CD) ⑥聯合部份左派政黨如「民主社會黨」(Partido Social Semocrata / PSD)和「社會主義墨西哥黨」(Partido Mexicano Socialista / PMS)等組合而成。該黨雖屬一個左派政治力量，但在意識形態逐漸褪色，公共政策主導選民的時潮中，已不再強調激烈的改革路線，改採溫和的務實主義，主張改善財與分配問題，要求重視社會福利政策，加強地方建設及照顧弱勢族群——工農群眾和土著民族，遂自許是一個代表中下階層的「鄉村政黨」，所以在貧困落後的州郡受到人民的支持。然而該黨與其他左派政治組織一樣，不論在組織基礎、財力及物力資源、黨內精英等方面，均甚薄弱，根本無法與具有悠久歷史且擁有雄厚政治資源的執政黨相匹敵。當然，左派各政黨不能在墨國政壇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也是「制度革命黨」繼續壟斷政治的客觀因素之一。

### 三、大選前之情勢分析

與一九九四年大選息息相關的要件或變數，除了前述的政黨因素外，其餘尚可歸納之為：執政黨的政績與選民對它的肯定度；相關之偶發事件及其對選民所產生之心理影響與認知取向；各政黨候選人所宣示之政見及所運用之選舉策略等要項。茲綜合析述之於下：

(一)執政黨之重要政績：首先，吾人知道，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結果，對執政黨造成了相當程度的震撼與衝擊，因為這次選舉為該黨寫下了四項刻骨銘心的空前紀錄：(一)此次選舉的投票總出席率最低，僅達百分之五一點三八；(二)「制度革命黨」當選人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總統的得票率，創歷史的最低，為百分之五〇點三六；⑦(三)左派政黨首次以聯合陣線的方式，合力參與總統選舉，竟然取得百分之三二點一二的支持率；(四)國會參眾兩院選舉結果，執政的「制度革命黨」第一次在眾院中失去了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優勢。

註⑥ 「民主運動黨」是「制度革命黨」的分裂物，其首腦人物卡法納斯因對戴拉馬法是政府經濟政策不滿，而且黨內高幹專擅弄權，貪瀆玩法，並缺乏改革誠意與決心，乃率領部份主張改革的清流分子脫離「制度革命黨」，於一九八七年十月與「社會主義人民黨」(PPS)、「社會主義運動」(MAS)、「社會主義墨西哥黨」(PMS)和「墨西哥真正革命黨」(PARM)合組一個「國家民主陣線」(Frente Democrático Nacional/FDN)，參與一九八八年的大選。

註⑦ 墨國自一九二九年年起，舉行總統全民選舉，該黨得票率在一九五二年以前之歷屆平均數在百分之八五以上；一九五八至七〇年的三屆平均得票率在八〇%以上，而一九七六年之得票率最高，竟達百分之九四點三九，八二年為百分之七〇點九九，八八年則劇降為百分之五〇點三六，見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7, 1994, p.10;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ul 28, 1988, p.2.

上述打破墨國選舉史的紀錄，六年來一直在警惕著執政黨，必須以痛定思痛的心情和策厲來茲的嚴肅態度，面對未來，設法在公共政策、施政品質、政治改革等層面，創造佳績，改善形象，始可望在下次（一九九四年）選戰中，爭取更多人民的認同與支持。茲就部份重要政績或治績簡析之於後：

(1) 財經改革：薩利納斯總統是自由經濟的守護者，他主政後，立即著手於財經改革，挽救墨國自一九八二年來幾臨破產邊緣的經濟困境。其所採取之經改措施，大體可綜合歸納之為：

**A 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國營企業私有化是墨國經改的主軸，也是經濟自由化的基礎。政府透過改組、清算、兼併和拍賣等方式，將政府所經營的大型企業或服務業，如礦產、燃料、通信、銀行、保險；等一千多家行號公司，讓給私人資本家（包括外資及多國公司）。如此，一則為政府開闢了大量財源；二則增強各企業的營運效能與競爭力；三則大為紓緩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使國家資源作了較為合理而有效的分配與運用。此一經改政策為墨國的經濟復甦與自由化奠定了基礎，普獲墨國人民的支持。<sup>①②</sup>

**B 壓縮通貨膨脹：**墨國像拉美地區其他國家一樣，曾為過高乃至極度惡化的通膨所苦，該國一九八七年的通膨率曾高達百分之二五九點二，薩利納斯於次年接掌政權後，是年年底將其壓縮至百分之五一點七，至一九九二年已降為百分之一一點九，而今年（一九九四）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將被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的目標區。此一治績對穩定物價、工資和一般人民的生活實質，以及促進經濟成長等，均具直接的正面影響<sup>③</sup>。

**C 健全財政收支：**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是薩利納斯政府穩定物價及輔助經濟成長的重要政策之一。墨國的財政赤字自一九八三年起，一直維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一七點六的高比位；惟自一九九〇年以後，始降至百分之一點五的比值以下（若以當年政府債務還本付息所佔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一〇點三的預算減去，則該年的實際財政收支可達到百分之一點五的盈餘）。<sup>④</sup>其實現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措施，係以推行上述之國營企業私有化及稅制改革為主體，同時，並未因為政府節省公共支出，而影響其社會福利政策之實施。<sup>⑤</sup>此一措施對「制度革命黨」在一九九四年大選方面，增加一項利多因素。

註① 在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過程中，不可諱言的，也為墨國社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與衝擊，如財富重分配問題，根據實比世雜誌所公佈之資料，墨國現有二十四大世家，其財富可以與二千五百萬低收入人民之總財產相比。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31, 1994, p.10.

註② 墨國的通膨率，一九八五年為百分之五七點八，八六年為百分之八六點二，八七年為百分之二五九點二，八八年百分之五一點七，八九年一九點七，九〇年百分之二二點七，九一年百分之二一八點八，九二年百分之二一點九，而一九九三年為百分之八點一，見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Feb 25, 1993, p.25; May 17, 1994, p.212.

註③ 請參向以斌「墨西哥發展戰略的十大變化」，拉丁美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三一—三六頁。  
註④ 薩利納斯政府在節省開支方面，係採取資源重分配的原則，即對社會支出項目非但没有削減，反而增加，如教育支出自一九八八年至九四年，增加了一倍；衛生及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的支出，在同期成長了百分之八十二；城鄉發展支出提高百分之五一，完全用之於公共設施的改善和中下階層人民生活品質之提升。見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四日，中國時報「季辛吉專欄」，第十頁。

D積極發展對外經貿關係：在薩利納斯總統的六年任期內本諸「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以及遵循「外向發展戰略」之方針，乃大力拓展其對外經貿關係，其舉筆大者，如在一九九一年秋與智利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同年又與中美洲五國（薩、瓜、尼、洪、各）簽署自一九九六年建立「自由貿易區」協議書，並於該年四月和歐共體簽署「經濟、科技與金融合作協議」，且在同年正式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於一九九三年成爲「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之會員國，並擬正式加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已開發國家的行列；以及今年（一九九四）元月初已使與美、加二國所簽署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sup>⑮</sup>

「制度革命黨」政府所採取的經改措施（被稱之爲「經濟革命」），爲墨國今後之經貿發展奠定了穩健的基礎，並爲該國的經濟復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良好成果，使其國內的經濟成長自一九九一年以來，保持著百分之一到四的實際成長率。因此，薩利納斯的六年經濟績效，爲其贏得了三項榮銜：締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設計師、通貨膨脹的打擊手、企業私有化先生。<sup>⑯</sup>當然，他的斐然有成之經濟政策，也獲得墨國多數人民的肯定和支持，這對一九九四年的大選來說，必然增加「制度革命黨」的得票機會。

(2)政治與選務改革：在一九八八年大選的衝擊以及在野黨與國人的強烈期望中，薩利納斯政府本著「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原則，於經濟事務導入正常軌道後，緊接著便推動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先對攸關聯邦議會、政黨關係、選務法令等，陸續的予以修改並修憲。如一九九一年完成關於公有土地所有權、政黨關係、選舉制度等之修憲工程；嗣後又繼續修改了選舉法規，如擴大參議院的席次，由六十四席擴大一倍，增加爲一二八席位（每州四名）；限制政黨聯合參選的基本資格以改善選務工作等。<sup>⑰</sup>藉以保障政黨參政與問政權益，並對政黨之活動空間予以合理的規範，爲一九九四年的大選工程，增

註⑮ 目前，雖有部份人民對墨國參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持反對的態度（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四點九；其中以農民、環保分子、反對派政黨人士及小部份受窘之中小企業主爲多數），甚至於一九九四年元旦在墨國南部恰帕斯州法爆發的印第安人反抗運動，也指責墨國加入此一「協定」，等於給墨國農民簽署了一紙「死刑判決書」。但經宏觀角度言之，墨國加入此一「協定」，對其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外資進場、提升產業結構與科技水平等，均具正面作用。如僅以美墨二國進出口貿易額一個單項觀之，其一九九四年一至七月底的雙向業績，較一九九三年總額增加九十億美元，所以，表示支持者佔有百分之六一點八的絕大多數。見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Nov 3, 1994, p.2.

註⑯ 薩利納斯總統現正乘其榮獲三項榮譽頭銜之良機，準備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卸下總統重任之後，將在明春競選「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首任掌門人職位。若薩氏能獲得美國的鼎力支持，很可能擊敗另三名競爭對手：意大利前任貿易部長羅希洛（Renato Ruggiero）、巴西財長里求比洛（Ruben Ricuperio）和南韓貿易部長金竹序（Kim Chulsu 音譯）等。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1, 1994, p.5

註⑰ 關於選舉法令及選務工作之改革事項，其舉筆大者如：規定各級候選人競選費用之上限、改革「聯邦選委會」（IFE）、設立聯邦選舉法庭、准許由民間團體組成龐大之監選團，以及廣邀國際媒體及觀察人士參觀選舉活動等。另在選舉技術方面，如換發國民身分證、製造特殊化學性印泥以杜絕投票人重複投票等。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7, 1994, p.7;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Apr. 21, 1994, p.3.

強了周邊設施。

(二)社會偶發事件：左右或誘導選票流向的因素固然相當複雜，除了前述之政黨屬性、選舉文化、執政黨的政績、公平的遊戲規則；等外，而選前或選舉期間的社會偶發事件，也同樣的會對選民心理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與暗示，因而左右其投票行爲。假若某項社會事件的形成背景與當前的政經問題息息相關，甚至根本即是一樁徹頭徹尾的政治案件，則更易被參選政黨和候選人所利用，作爲選舉造勢或政擊對手的工具。

正值時序進入全國大選之際，墨西哥卻在一九九四年春，連續發生了數起嚇人聽聞的暴力事件，爲當年八月下旬的大選，投下了難測的變數。這些偶發的事件是：

(1)恰帕斯州印第安人動亂：一九九四年元旦，位於墨國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境內兩千多印第安農民，突然揭竿而起，與當地政府軍發生了武裝衝突，並佔領了部份城鎮，同時，以「薩帕特民族解放軍」(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EZLN)的名義，發佈了一份「戰爭宣言」，指責聯邦政府嚴重忽視少數民族的生存、參政、財產(土地)與社會福利權益，並要求聯邦政府就政、經、社、司法、人權：三十四項問題，進行談判，以資解決之。<sup>19</sup>

薩利納斯政府爲維護墨國的國際形象、社會安全、經濟發展，以及即將舉行的大選能夠順利如期實施，不致因此事件之發生而爲執政黨造成負面影響，乃採取了硬軟兼施的緩撫手段，一邊派遣重兵壓境，一邊指派談判代表，在天主教「解放神學」大師—克里斯托巴主教路易茲(Samuel Ruiz)的斡旋下，與叛軍代表展開了和談，雙方除達成停火協議外，政府亦允諾接納對方所提之絕大部份要求(三十四項要求中的三十二項，後二項係涉及全國性事務，如修憲問題，而予拒絕)，遂使此一恰州動亂問題暫時獲得舒緩，惟「民族解放軍」迄未答應放下武器的要求，聲稱須在聯邦政府完全並充份滿足其全部之要求後，始願解除武裝。<sup>20</sup>所以，恰帕斯的動亂問題迄今仍未徹底解決，須待新政府去繼續努力了。不過，此一事件適發生於大選之前，自亦會對選情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2)執政黨總統候選人被刺：在恰州動亂尚未平息之際，「制度革命黨」所提名之總統選候選人柯洛西歐(Luis Donaldo

註19 「薩帕特民族解放軍」所要求之改革事項：少數民族之平等參政權、改善貧困地區人民的教育品質、公共衛生、基本生活條件、印第安農民應擁有自己的土地、懲治地方酷吏與地方角頭等不法分子、免除土著農民所積欠之債務、修改憲法第二十七條(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以及指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農民所形成之傷害：等。見*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Mar. 17, 1994, p.110; May, 19, 1994, p.212.

註20 關於恰帕斯州原住民動亂的緣由、過程與現況，請參見東振「從墨西哥恰帕斯危機看拉美農村發展中的問題」，拉丁美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二八—三三頁；Lucy Conger, "Mexico: Zapata Thunder", *Current History*, Mar. 1994, pp.115—120;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5, 1994, p.146.



Colosio)，在其初期競選活動中，於三月下旬在鄰近美國加州的一個城鎮(Tijuana)遇刺身亡。<sup>20</sup>此一意外之暴力事件立即引發墨西哥及國際間的震驚，同時，也為墨國即將在八月下旬舉行的總統選舉投下一個極大的變數，無論這樁謀殺案之動機與目的是甚麼。<sup>21</sup>而該黨也必須立即另尋遞補者。

(3) 銀行家被綁架事件：正值恰州農民暴動事件的餘震未息，而柯洛西歐被謀案疑雲重重之際，墨國媒體又在今年四月中旬披露一項驚人的消息——墨國一家最大之私人銀行「墨西哥民族銀行」行長阿帕(Alfredo Harp Helu)，早在三月份被綁架勒贖案件。<sup>22</sup>綁匪也同時透過媒體向阿某家屬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支付兩億美元贖金。此一案件不僅引起政府當局的關注和社會的廣泛不安，甚至對外商的投資意願也形成衝擊，而且間接的影響著墨國的經濟穩定與發展，以及選民的投票意願與抉擇。

近年來，由於墨國經濟自由化腳步日快，財產分配不均現象日趨嚴峻，社會治安問題與犯罪案件也與日俱增，再加上政府公權力不振及法治效果不彰，早已為墨國人民所詬病。而今綁票勒贖案件相當猖獗，僅在一九九三年便發生了五百多件，所要求的贖金金額，從幾萬到數千萬美元，甚至更高。最為駭人聽聞的消息則是：警察在上班時，扮演執法人員；在下班後，則可能參與綁架的勾當，與黑道分子坐地分贓。<sup>23</sup>

上述三項重大反社會事件，適在選舉前夕相繼發生，既說明墨國社會充斥著各種矛盾，又顯示該國的社會治安已相當惡化，更為即將投票的四千五百多萬公民，明示或暗示一個心理選項——社會治安問題認知或轉嫁為執政黨的敗績，抑將其銓釋或轉換為選民對社會安全之訴求——由選民決定之。

#### 四、各黨總統候選人政見分析

<sup>20</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9, 1994, p. 7.

<sup>21</sup> 關於柯洛西歐案件之動機、目的、兇手與案情之真象，迄今仍有許多疑點尚待查證；或稱該暴力事件係出於黨內權力鬥爭，或指係與毒品走私有關，或猜測部份案情含有私怨等。至於兇手的人數問題，從六人減為三人，最後，墨國高檢單位宣稱：真正的兇手只有當時行兇的阿布杜(Mario Abuto Martinez)一人，但墨國人民對此表示懷疑，現正由國會進行調查中。見Newsweek, Apr. 18, 1994, pp. 24-25; Time, Apr. 4, 1994, p. 32.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Aug. 25, 1994, p. 374.

<sup>22</sup> 關於阿帕被綁勒贖案件之詳情，可參Time, Mar. 28, 1994, pp. 31-32; 香港文匯報，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第A4頁。

<sup>23</sup> Time, Mar. 28, 1994, pp. 31-32.

政見發表，係各黨候選人將其所屬政黨及個人之政綱、政策、理念、施政方向與追求目標等，直接訴之於選民的有效工具；今僅將墨國三大政黨候選人的政見分析之於下：

(一)「制度革命黨」：該黨總統候選人柴迪洛(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ón)，原先擔任總統候選人柯洛西歐之競選總幹事，在柯氏被刺後，即為現任總統薩利納斯指定為候選人。<sup>②</sup>柴迪洛既繼承柯洛西歐為該黨遞補之總統候選人，其政見也部份的承襲了柯氏的腹案，如社會改革與區域發展等。今就柴迪洛之競選政見與總訴求，析述之於後：

1. 增加公共投資：一九九五年提高百分之二五，以改善教育、訓練與保健之品質；
  2. 改革稅制：稅制改革以賦稅公平和調整產業稅負為手段，促進經濟的成長為目標；
  3. 提高國內儲蓄：增加資金積累，以利經濟發展；
  4. 勞力改造：加強職訓，提升勞力品質，開發就業市場，擴增就業機會——一九九五年增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5. 加強基礎建設：增加交通設施，提高運輸能量；
  6. 發展聯合企業：引進外資，提高技術水平；
  7. 拓展對外經貿關係；
  8. 改善農業：增加農業貸款金額，以利農業發展；
  9. 重視環保與生態平衡；
  10. 加強推動社會福利政策：改善公共衛生，廣建平民住宅，促進鄉村發展，提高紓困貸款額度等；
  11. 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品質，保障基本人權；
  12. 維持中度經濟成長：一九九五年國內生產總值目標為百分之三點八<sup>③</sup>。
- 由於「制度革命黨」長年執政，既積累了豐厚的資源，也背負了一個沈重的包袱——貪污、腐化、治安不良、法治不彰，以及千瘡百孔的社會問題。因此，柴迪洛所提之競選政見係以經濟發展為主軸，以提高社會福利為輔佐；在改革方面，僅簡單的提及司法與人權問題，惟對政改項目，則隻字未提，因他唯恐引發黨內保守派的強烈反彈。不過，他已洞悉墨國人民對

註②

柴迪洛曾接受美國的教育，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薩利納斯政府擔任過計畫暨預算部長和教育部長等職，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技術官僚，在黨內沒有政治資源與人脈背景，而且毫無參選公職的經驗，所以在他被指定為總統候選人時，曾引發該黨元老派與黨官的強烈反彈，並製造分裂。見*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un 2, 1994, p.230;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Jun 16, 1994, p.2.

註③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Aug. 25, 1994, p.5;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7, 1994, p.10.

新政府的企盼，所以，他將「安全、發展、改革」作為競選的總訴求，並提出一項「反貧困的十點計畫」，以資爭取中下層階級的認同與支持。<sup>26</sup>

(二)「全國行動黨」：該黨為墨國之第二大黨，也是主要的反對黨，其總統候選人費南德茲(Diego Fernández de Cevallos)之主要競選訴求為：改革、民主、清廉、效率。他所提出之競選政見，大體可綜合析陳之於下：

1. 改革現存政治體制：完全回歸憲法，行政部門須接受立法之監督，讓司法充分獨立，以確保社會正義；
2. 修憲：賦予人民行使複決及「公民投票」的權利。
3. 全面改革警察及法治單位，使之守法守紀；
4. 充分尊重少數民族(印第安人)之合法權益——政治、經濟、自由與傳統文化；
5. 發起全國反貪運動；
6. 制定全國住屋計畫：廣建平民國宅，使居者有其屋；
7. 籌設「聯邦籌款理事會」(Consejo Federal Tributario)：為各州郡籌集建設基金；
8. 建立「全國鄉村發展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del Campo)：由各級政府與各地農民聯合組成之，共同研究農村發展問題；

9. 充分保障人權，樹立司法公信力，維護社會正義。<sup>27</sup>

今就該黨總統候選人所提政見之內容觀之，吾人當可清楚認知：「全國行動黨」係以政治改革為首務，地方建設與農村發展次之；惟在經濟政策方面，除了在選競時曾反擊薩利納斯政府所推行的自由經濟政策外，卻未能提出該黨之具體經濟主張以代之。

(三)「民主革命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卡德納斯(Luauhtemoc Cardenas Sol'orzano)鑒於左傾的政治主張在當前的「政治消費群」中，缺乏推銷市場，遂在此次的競選策略與政見兩方面，刻意採取較為溫和的中間偏左路線，儘量避免被執政黨再度貼上「左傾、激進、崇尚政治暴力、製造社會動亂」的極左標籤。尤在恰帕斯州農民暴動後(見前)，甚恐遭到對手的抹黑，故僅在政見中提出：反專制(「制度革命黨」一黨專政)、反貪污、反特權、反金權、反現存(行)政治體制，並要求墨國選民以選票揚棄「制度革命黨」政權，給「民主革命黨」一個建立廉能新政府的機會，其經濟政見也一反一九八

註<sup>26</sup> 關於柴迪洛所是「反貧困計畫」之內容，請參Mexico and NAFTA Report, aug. 25, 1994, p. 5.

註<sup>27</sup> Ibid.

八年競選時所提出之「激進」主張——保護主義與國有化政策——惟仍堅持實行土地改革，保護農民經濟利益，加強鄉村建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政策與改善貧困階層的生活品質等。該黨的競選訴求是：建立一個公平、正義與民主的新社會和新秩序。該黨的具體政見可簡述如下：

1. 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與社會；施行公正的選舉，消除「工團主義」的統治方式，釐清政教關係；
2. 均衡發展原則：制定發展綱領、調整產業結構，引進外資，提高國內儲蓄，推動稅制改革，合理分配所得，以及善用天然資源（能源）等；
3. 建立新的社會公約：保障企業界權益，提倡職工參與式民主，制定最低之工資法令，統籌全國住宅興建計畫；
4. 檢討對外關係：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發展區域政經關係，並與美、加二國保持平衡夥伴關係。

## 五、大選結果

一九九四年的大選，於八月二十一日很順利的在全國舉行。選前數月，墨西哥和國際媒體及民意調查機構等曾作過多次各種問卷及電話訪問，雖然各次調查或訪問所得之結果略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但其中卻出現了一個不變的常數，即執政的「制度革命黨」仍會在總統選舉中保住其政權，唯所獲得的支持率將不會超過百分之五〇，其他各黨如「全國行動黨」可能獲得百分之三〇左右的選票，而「民主革命黨」的得票率將落在百分之二〇上下，其他各小黨的總得票率將不會高過百分之十。另一項預測資料顯示：參與此次選舉投票的出席率將會比一九八八年的出席率略高，但不會超過百分之六五的上限。<sup>②</sup>

當墨國聯邦選委會正式公佈此次總統選舉結果時，最使國際觀察家、新聞界及墨國政治學者感到驚訝的，則是參與這次選舉的出席率竟高達百分之七七點七，在全國四五、七二九、〇〇〇的合格選民中，有三五、五五〇、〇〇〇人投下了他們的一票。其中由執政的「制度革命黨」候選人取得了一七、三三三、〇〇〇張有效選票，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八點七七，創下了該黨歷次參選總統得票率的最低紀錄；「全國行動黨」候選人獲得九、二一一、〇〇〇張選票，得票率為百分之二七；而「民主革命黨」的總候選人則僅贏得五、九〇一、〇〇〇張選票的支持，其得票率為百分之二八，其餘不到百分之十的選票，由六個小黨的候選人所分得。<sup>③</sup>

註②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8, 1994, p.2; May 16, 1994, p.3;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Jun. 16, 1994, p.1.

註③ *Mexico and NAFTA Report*, Sept. 29, 1994, p.2.

這項總統選舉結果與選前所預測的數據相當接近，除了總投票率大為高過預測值，多達百分之二〇以上。而且這一高投票率也未產生一般政治觀察家所預期的選舉效應——高投票率會對執政黨候選人產生利空作用，因為往昔歷屆選舉缺席者，多為對執政黨統治之不滿分子——中產階級與自由派人士。

另在聯邦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方面，執政黨同樣獲得全勝。在參院新增設的六十四席中，「制度革命黨」囊括了全部的席次；其餘應改選的三十二席，則由「全國行動黨」和「民主革命黨」依比例代表制規定，各分得二十五席和七個席位；再加上該院於一九九一年期中選舉時所產生的三十二席（執政黨三十一席，「全國行動黨」一席），共為一二八個席位——其中由執政黨佔據九十五席，「全國行動黨」佔有二十六席，而「民主革命黨」僅有七個席位。

關於眾院的選舉結果，共有四個政黨在該院擁有代表權；即在五百個席位中，由執政黨手控制了三〇〇席，「全國行動黨」取得一一九席，「民主革命黨」佔六十九個席位，而「勞工黨」(Partido del Trabajo/PT)則分得十二個席位（上述席位皆含比例代表在內）。

就墨國聯邦議會兩院各黨所佔之席次觀之，執政黨雖在參院擁有絕對多數，但在眾院卻僅佔簡單多數。因此，若遇重大法案如修憲等，則必須爭取在野黨的合作與支持。由此可見，柴迪洛總統的施政與改革，勢將面臨來自國會的挑戰或引發府會之爭，不過，從以往的府會運作經驗推理之，當執政黨遭遇困難時，「全國行動黨」總會在某種條件下，願助執政黨一臂之力，除非墨國的政治生態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如在野的兩大反對黨攜手合作，組成一個聯合陣線。<sup>30</sup>

## 六、結 論

墨國一九九四年大選結果已塵埃落定，其進行過程尚稱理性和平，也未曾出現像一九八八年大選後的激性與抗爭場面，雖然「民主革命黨」仍對選舉的公正性與公平度，表示懷疑，迄今尚不願承認「制度革命黨」總統候選人獲勝。但根據國際媒體與觀察家實地觀察經驗所得，認為這次選舉確是墨國選舉史上最為公平、公正、乾淨、自由、和平的一次，雖然仍有部

註30 墨國的部份學者認為：若想打破「制度革命黨」一黨專政的局面，並改善墨國當前的政治生態，最佳的途徑就是「全國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各自調整或修正其組織形式和政治理念，找出一條求同存異的務實捷徑，合組一個「民主同盟」或「民主聯合陣線」。見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13, 1994, p.7.

份違失與不合政黨政治倫理之處（如行政不夠中立、執政黨動用的選費超限、媒體使用及報導不公；等）。<sup>②</sup>

至於這次選舉對墨國的政治生態與政黨政治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雖非相當深遠，但經選後各黨所進行的檢討結果與所發生的意外事件（如執政黨秘書長於九月下旬被刺案件），<sup>③</sup>加以觀察之，執政黨內部「恐龍派」（元老派）與「維新派」（技術官僚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將愈演愈烈，如柴迪洛不能找到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該黨可能將會步上日本自民黨的後塵。而在野黨派若想獲得墨國選民的支持，除應掌握選舉時所顯示的社會脈動、選民心理與基本要求外，尤應積極營造黨的基層與培育黨的精英。若想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戰中，贏得執政的機會，唯有「全國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兩大在野勢力，合組一個「民主大同盟」，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始可望有成，並能進而改變墨國當前的政治生態，同時可將政治民主化推上一個新台階。

柴迪洛總統已於十二月一日依法正式就職視事，他除了須對全國人民實踐其競選政見與諾言外，其施政的方向應是：如何確保墨國的社會安定，解決少數民族與貧困州郡的民生問題與土地改革問題，並進而緩和乃至紓解財富分配日益極化的現象。因為一國經濟利益的畸型分配，既有違社會正義原則，亦不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更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脫稿

\*

\*

\*

註① 關於此次選舉違失與弊端，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5, 1994, p. 5.

註② 「制度革命黨」秘書長路易茲·馬秀 (Jose Francisco Ruiz Massieu) 於九月二十九日在該黨總部前被刺，其遇害原因尚在調查中，據稱係由黨內高幹與政府要員所策動，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7, 1994, p. 6, Sept. 30, 1994, p. 5.